

· 乌鲁木齐史话 ·

地方文献中关于乌鲁木齐戏曲活动的记载

乌鲁木齐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靳文奎

提 要 本文介绍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间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戏剧曲艺情况,尤其对迪化的京剧与秦腔的发展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话剧表演进行了详细描述,乌鲁木齐的戏曲发展、兴盛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乌鲁木齐戏曲之繁荣是中国戏曲繁荣昌盛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键词 清末民初 迪化(乌鲁木齐) 庙会 戏曲

乌鲁木齐有戏曲,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那时,乌鲁木齐称迪化,已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的戏曲活动非常活跃,根据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和老年人的口碑资料记录,戏曲活动大致可分清末民初、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而抗战时期的戏曲活动尤为繁荣。

清末民初时期,迪化地区戏剧活动,庙会是典型。清乾隆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晓岚(纪昀)在所发配乌鲁木齐期间,所著《乌鲁木齐杂诗》中写到当时迪化有“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买座,略似京师”,又说:“当时有梨园数部,遗户中能昆曲者,又自集一部,以杭州程四为冠,歌竟数部,初以佩玉,佩玉一部为冠,今昌吉遗户子弟新教一部亦相面。著名的伶人鳖羔子以生擅场,然不喜盟面,留大头以丑擅场,虽京师名部不能出其上也,刘木匠以旦擅场,年愈三旬,资致尚在,遗户何其能以楚声为艳曲,其《红绫裤》一阙尤妖曼动见。”寥寥百余言新鲜生动,一应戏曲名伶,跃然纸上。将一个当时只有万余人的乌鲁木齐戏曲活动概况,有各演员之特长,习惯生动记录在卷。《乌鲁木齐杂诗》(吟红山)又一首写道:“炳岚遥对翠芙蓉,鄂博(注:碎石垒起的登坛)犹存旧日踪。缥缈灵山(注:博格达山峰)行不到,年年只拜虎头蜂”。每年农历四月八日,红山嘴虎头蜂庙会演戏非常盛行,声势浩大。清道光二十五年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杂诗》还记载:“稗史荒唐半不经,渔樵闲话野人听,地户松火消长夜,目唤诙谐柳敬亭”。迪化柳敬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演技精湛,有口皆碑。

清朝文人桥园在《新疆记略》中说:“迪化城字号商店,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糅,酒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荣富庶甲于关外”。清人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记述:“过北门乾州会馆,值演戏,士观环如堵,有七八处积人成堆…”。

清道光二十五年,爱国将领林则徐,途经迪化时,观看过迪化元宵盛会,有“红庙(迪化的别称)元夕,灯市颇盛,自城内至东关外,通街多竖牌坊,燃数夜…”的记载。

这个时期,戏剧主要是以庙会的形式表现。据乌鲁木齐(迪化)史料记载,每逢农历“三月三”至农历“九月九”,迪化都有庙会,“红山庙会”(四月初八)因其日子好,在诸多迪化庙会中最具规模,首屈一指。清末民初时期,乌鲁木齐(迪化)神众庙多,据地方志史料记载,较大的就有20多座,除红山群庙外,有供奉三仙姑的仙姑庙;供奉天官、地官、人官的三官庙;供奉孙思邈的药王庙等等。迪化可谓有庙必有神,有神必有庙会,逢庙会必搭台唱戏以谢敬神灵。互不落后,竞相攀比。当时几乎是日日有庙会,会有戏看,每逢会,大人小孩蜂拥而至,扶老携幼,年复一年,愈来愈盛。看得多,演的来劲,演的来劲,观众更多。具规模的有城隍庙会、老君庙会、龙王庙会、关帝庙会、财神庙会、娘娘庙会、武庙庙会、王爷庙会、药王庙会、仙姑庙会等,诸庙会中红山庙会规模最盛。

凡庙会之日,众香客争先恐后,游人如织,车水马龙。高峰时,商贩云集,摩肩擦踵,人群杂踏,江湖艺人各显神通,庙宇中香烟缭绕,如云似雾。更加庙会中有

“庙首”拉拢的“几个买家”，印发红帖子捐香资，先期挨门挨户收取银两、捐钱，用来燃香敬神演戏，由此，各零散戏班戏人亦蜂拥而至，借庙会戏台、戏场献艺演唱戏曲，使庙会更加热闹非凡。至清光绪十六年“红山庙会”上终于诞生了迪化第一个正规剧班，1890年农历四月，一个流浪到迪化的兰州秦腔（旧称桃桃）艺人吴占鳌，为了更好地在红山庙会上招徕观众、扩生意，就向流落在本地的各地秦腔艺人提出组织一个秦腔社，参加红山庙会演出的倡议，当即得到各地流落艺人的响应，乌鲁木齐（迪化）不仅本地艺人纷纷参加，就连邻县的一些艺人都都赶来，要求一块演出，演出大获成功。随后众人约定日期，召开联合会议，公推吴占鳌为领班。以新疆省名为首字，成立定名“新盛班”。这是秦腔在新疆出现最早的民间演出团体，亦是乌鲁木齐秦腔艺术表演团的早期形式。“新盛班”成立之后，秦腔事业振兴，艺人为了赶赴庙会演出丰富节目，就各人原在内地所学的剧目，拼凑排演几个小折戏，如：《赴雪山》、《花事相会》、《三娘教子》等，随即在红山庙会演出。由于新疆在此以前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大戏形式的班社演出，因而“新盛班”此举首次在迪化问世，让人颇为新奇，一时轰动红山庙会，轰动迪化整个城乡。从而把“红山庙会”戏剧演出推向了一个新的形式和高度。“新盛班”为秦腔剧种在乌鲁木齐及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史籍记载，尽管当时的演出班社设备简陋，演出粗糙，但是民众争相传说，上红山、拜神、看戏一举两行。为争看个新鲜，都纷纷涌向红山，致使迪化红山庙会每年出现了“观者如堵”的状况。

1891年，迪化河北商人王希增，把会唱河北梆子的艺人聚集在一起，组成“吉利班”。“吉利班”以京津艺人居多，也常在庙会及各会馆演出，但因演员少，服装道具简陋，只能以“坐台清唱”为主。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继秦腔“新盛班”之后，河北梆子艺人也感到戏曲坐台清唱已不能满足市民的文化要求。1919年，有伊犁和迪化两地的津帮商人筹资，以穆建君、李树春为首组成一个河北梆子班社——“天利班”。1919年，从天津请来京剧演员籍晓甫（以丑见长，人称籍丑），“天利班”除河北梆子外，加演京剧。随后又有从天津杨柳青“同乐班”中分化出来的京剧演员陈月楼、陈月桥、赵德风一行32人，从天津一路演出，乞讨到达迪化，加入“天利班”。由于他们的加入，“天利班”出演阵容改观，从演员、服装、道具到剧目，独占鳌头。此

时迪化已有四个戏班：清华班（湖南花鼓戏），“新盛班”（秦腔），“吉利班”（河北梆子），“天利班”（河北梆子、京剧），但都没有演出场所，主要以“庙会”和“堂会”、酒肆、歌楼等处演出为主。纪晓岚《乌鲁木齐杂诗》中写到“乌鲁木齐酒楼数处，日日演剧”即是当时情景。

1933年，迪化“吉利班”在周玉和、范晋三等人的帮助下，利用三角地“定湘王”庙的戏台开办“光明戏院”；接着“天利班”在商界票友杨寿松、宋振禄支持下，利用小十字中州会馆开办了“新星舞台”；秦腔“新盛班”（后改为“三合班”）利用中州会馆后院开办了天山（剧）戏院；翌年，秦腔票友袁阁发起，利用“老君庙”戏台开办“元新戏院”，至此，结束了各路艺人只有漂流做演出的一条路子。以上剧院设备简陋，条凳、汽油灯，但艺人终于有了固定演出场所。迪化大十字一条街，戏院毗邻，灯火相联。

抗日战争时期乌鲁木齐（迪化）的戏曲活动非常繁荣昌盛，是乌鲁木齐戏曲史上一个鼎盛时期，演唱曲很普通。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巩固新疆这个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在乌鲁木齐积极开展抗日活动。据文史资料《抗战期间乌鲁木齐上演的话剧剧目》、《忆迪化市孩子剧团》、《忆迪化市实验剧团》、《抗日战争迪化艺人献金活动》等记载，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西路军新兵营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为先导的抗日戏剧活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反帝会、工商会、学联会、民联会、妇女联合会、民教馆等组织，联合组成了支持前方将士“募集寒衣委员会”，领导全疆“募寒”运动。迪化组织起24个宣传队，各族各界人士及文艺工作者用戏剧、歌舞、演讲等形式进行抗日“募寒”宣传，当时流行口号是：“抗战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38年11月，迪化戏曲界名伶曹筱芬、魏桂红、刘艳霞、翠灵英等在各戏院纷纷表示“抗战高于一切，募集抗日捐款，愿尽长期义务，不取分文……”。新疆曲子剧也不甘落后，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马寡妇开店》改编为《消灭汉奸》。实验剧团、孩子剧团最为活跃，排演了大量小话剧、活报剧、儿童剧等，从《抗战期间迪化上演话剧剧目》可以清楚地看到，剧目之繁多兴盛。1939年茅盾、赵丹、王为一、徐韬、叶露茜等来疆后倡导与亲自编剧演出，在他们的影响下，话剧呈空前的繁荣景象。新疆话剧运动方兴未艾，在此之前1931年即有

由东北到苏联又辗转归来的东北义勇军演出的“文明戏”。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应盛世才之邀从延安陆续派来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到新疆(迪化)工作,话剧运动由“文明戏”进入话剧阶段。当时,在领导与组织开展话剧戏曲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林基路、李运扬、刘子平、陈谷音、于村、白大方、朱旦华等。1939年,蜚声文坛、誉满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茅盾、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叶露倩、俞佩珊、徐韬等加入其行列。带动了一大批学生、教师和文教界人士活跃在话剧舞台上。话剧演出团体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除新疆实验话剧团为专业性演出团体外,其余均为业余演出团体,较为有名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有新疆省立一中、新疆省立女中、新疆省立师范、新疆学院戏曲演出队等。演出剧目繁多,当时的确是全国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1937年至1945年,共编排、上演了《新新疆进行曲》、《战斗》、《民族公敌》、《前哨》、《民族魂》、《阿娜尔古丽》、《沙曼古丽》等近200余出剧目。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类戏曲、曲艺、话剧团体艺人争相恐后,为宣传抗战募集募捐,采取了多种形式。有戏院义演数日,有以单位名义邀请名角名票义演,有反串、双簧,有邀请各戏院坤伶合演,有单校、单队演出,有合校、合队演出,并且打破了当时戏班、剧种,行当的界限,以吸引更多观众。义演中,艺人八仙过海拿出最好的剧目绝活奉献给观众,尤其是京剧演员赵德风、何全侠合演的《白马坡》,张维忠、曹雪芬合演的《走雪山》,话剧演员周玉和、韩嘉麟、赵福生合演的

《匹夫救国》、《新花子拾金》,省三小王家祥、韩嘉麟、芷之权三位同学演出的《吊龟》、《女起解》令人侧目,他们还被秦腔剧团邀请合演了《郑成功抗日》一剧,当时该剧在各戏院义演海报一经贴出,人们更争相传告,戏票很快销售一空。

据抗日战争时期文史资料记载,1941年为纪念“七七”抗战4周年,乌鲁木齐(迪化)市举行了“戏剧比赛”与“话剧比赛”等赛事活动。这种新疆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举措,很受人们的猎奇与欢迎。从1941年戏剧比赛中,新星舞台参赛的剧目是《血战卢沟桥》,元新剧院参赛的剧目是《消灭汉奸》,西北大戏院上演的《热血》,天山会堂参演的是《千人针》,新疆汉族文化促进会召开评判委员会,推选出于村为评判长,韩玉麟等11人为评判委员。戏剧比赛期间,汉文会俱乐部门前张灯结彩,墙上挂满红红绿绿的抗战标语,均为座无虚席,场外群众围观如堵,观念被剧情所染,对演员的精湛表演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中间休息时,各学校的宣传队教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抗战戏剧如火如荼。

乌鲁木齐(迪化)各戏院的艺人,各学校的剧团、演出队,中共直接领导的实验话剧团,在抗日战争期间,进行了长期大量的义务演出,不仅为抗战前线募集大量的物资金钱,同时也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编辑 李卫东)

(上接第47页)

这个石窟周围并没有发展扩大的痕迹,石窟壁画中供养人题记也没有增加或更迭的迹象。从“己巳年”游人题记中可知,阿艾石窟为盛唐时期佛教遗迹无疑。安西大都护府移置龟兹后,龟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更加繁荣,在龟兹冶炼中心开凿一座佛教石窟,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是在情理之中。

古代龟兹从汉代起就是西域重要的冶炼中心,它的产品可以满足西域三十六国的需求。《水经注·河水篇》引《释西氏域记》记载了当年的冶炼景象:“龟兹北二百里大山中,昼夜火光烟气,取此石碳冶铁。可供

三十六国使用。”这座煤炭矿就是现今的库车煤矿冶铁矿,也是现今库车钢铁厂。所以从采掘到冶炼应该有相当规模的人群,在这个冶炼中心开一个宗教礼拜场所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是情理之事。佛教在西域流传如此广泛,在人群聚集地还应该存在着伽蓝佛寺,只不过年代久远,阿艾古城早已不复存在,遗迹也无从可考而已。那么仅存的石窟,汉风壁画以及短暂的使用时间,结构简单的窟形,狭小的空间,反映了公元8世纪前后佛教在龟兹地区的最后一道余辉。

以上论点是笔者从地理位置、洞窟形制规模、壁画风格、人物形象以及题记等综合因素探询阿艾石窟的结果。

(本文编辑 刘 星)